
抗战初期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和著作

高兴祖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就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震动，成为报道的热点。这里，就我所掌握的1937—1939年有关的公开报道和出版的资料，作如下介绍。

在中国，事件发生当时，各记者就对这一惨案作了大量报道。如《大公报》（武汉版）1937年12月16日就刊载了《某西人目击新到日军军官室内有少数妇人》。此后，几乎连续不断的作了报道，如1938年1月22日，2月2日、7日、9日、20日、23日，3月5日、7日、28日等等。其中2月2日的报道是《南京国际委员会某委员乘美国蜜蜂号军舰赴沪谈话》，2月7日是《一笔血债，京敌兽行目击记》，2月20日《沦陷后的南京惨象》，2月23日《陷落后南京，敌迫我已解除武装之军士五百攀登司法院四楼屋顶，竟引火焚楼》。3月28日《暴敌兽行世界彰闻》，揭露日军蹂躏南京妇女，并转引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28日报道：“某传教士于1月11日自南京来函谓，某日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同行，但见市街尸体狼藉。”还说，“献身于宗教的女尼在庵中被日寇强奸、屠杀”。“此为去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四星期后之事”。3月5日的报道中说：“敌方商人乘机来京营业者，宛如潮水。近在太平街一带商业区所开设之敌方商店，达一百四十家之多，大抵为旅馆、饭店、咖啡馆、酒馆及妓寮。至日用商品及化妆品，亦复不少。但顾客皆为敌方军人。闻此项商人从前皆在汉口、长沙、宜昌各处经商者。”

其他报纸报道的也很多,如《新华日报》仅1938年头3个月中,就有十余篇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其中1月25日的报道说:“难民区中之壮丁,皆指为士兵而被整批枪杀”,“除被迫搬运物件者外,殆无所谓俘虏”。又如《申报》(武汉版)1938年1月25日报道《紫金山下杀人竞赛》,5月30日报道《某君昨脱险由京来汉谈话》。《政治日报》1938年连载记者范式之的报道《敌蹂躏下的南京》。西安《西京平报》1938年8月连载南京守军营长郭歧的《陷都血泪录》。还有广州《国华报》1937年12月26日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奸淫、掠夺和屠杀。《蒙藏月报》1938年3月刊载《敌军在京屠行种种》等等。

国外报道也很多,如《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发表了该报记者都亭(F·T·Durdin)的目击记,标题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市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蒋介石战术拙劣·守军将校逃跑,致使首都失陷》。1938年1月9日又发表了他的报道《南京侵略军枪杀2万人·日军集体屠杀·包括一般市民·死者三万三千人·征服者放荡无羁·为所欲为·暴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憎恨》。他写道:“对普通市民的杀害日益扩大。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都有市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常常看到老人脸朝下倒在马路上,这是被疯狂的日本兵从背后射杀的……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杀害的。”“市内南部和西南部没能逃出来的许多中国平民,都被屠杀了……日军占领以后,记者曾访问南京。由于日军炮击,各地几乎被破坏殆尽,到处横呈着普通中国平民的尸体”,“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此外,该报上海特派员阿本德报道了《日军杀害俘虏、老百姓和妇女、儿童》。12月24日《纽约时报》还发表了《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的报道。12月2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Archidld·T·Steele)在南京拍发(迟发)消息《日军在南京的屠

杀、掠夺》。美国《生活》杂志1938年1月10日刊登了一组照片，标题是《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照片惨不忍睹。还有《大美晚报》1937年12月23日报道《日军在京军纪荡然》。英国《每日电讯报》1938年1月28日报道《暴敌兽行世界彰闻》。《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百人斩超纪录——向井一〇六对野田一〇五，两少尉进一步进行比赛》。香港《工商晚报》1937年12月25日《敌于南京陷落后恣意屠杀，壮丁五万人惨遭杀戮》。新加坡《星洲日报》12月26日《日寇兽性发作，于南京大肆屠杀》。还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 Review,后改为China Weekly Review)接连不断地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诸多外国报纸的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阪朝日新闻》(华北版)1938年4月16日的报道，标题是《南京通讯第五章卫生之卷》，说“红十字、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属的僧侣们携手合作……到最近为止，已在城内处理了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尸体，城外处理了三万零三百一具尸体……”，证实了中国慈善团体红十字掩埋尸体的数字。

报纸之外，当时中国的杂志也大量刊登了日军南京暴行的文章，如《新民族》1938年第一期《地狱中的南京(地狱通讯)》。《华美》1938年3月号刊载园生译《陷落后的南京》。《半月文摘》1938年5月二卷六期《地狱中的南京》，作者沦陷时未能逃出南京，目睹了日军在难民区的暴行。《宇宙风》1938年7月第七十一期刊载了林娜写的《血泪话金陵》，记述了从南京逃出的覃姓难民的目击记。还有上海黎明书局《文摘战时旬刊》1938年8、9、15、16号四期都刊载了日军南京暴行的文章。《闽政与公余》1938年1月第二十期《失守后的南京》，也是对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的采访纪实。还有《国讯旬刊》1938年11月12日刊载了沙骏的《日寇在江苏》等等。

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图书也相继出版，如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年3月出的《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其中有《南京暴敌之酷行》、《荣华京都被敌摧毁殆尽》和《南京已成盗匪世界》。中国国民

党广西党部 1938 年印发了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李为某文化机关职员,1938 年 6 月才逃出南京,此文曾在武汉《大公报》1938 年 7 月连载,《大公报》还为此专发了社评《读〈沦京五月记〉》。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毅 1938 年 2 月底逃出南京后,就写了《陷京三月记》,但此书 1949 年 2 月才由南京通志馆印行。还有时代出版社 1939 年 1 月出了杜呈祥的《日寇暴行论》。独立出版社 1939 年 5 月出了《日寇燃犀录》,其中有“寇迹遍江南,六朝金粉今蒙尘”等节。上海杂志公司 1938 年 8 月出了陈正漠编的《日寇的残暴》,其中有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的记事。南京晚报社出版部 1938 年 11 月 25 日出了白芑的《今日之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1938 年编印了《民族之血》。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 1939 年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其中有《日寇在华中的暴行——南京、徐州、苏州、扬州》。正中书局 1940 年 3 月出了文金编著的《敌人的暴行》,其中有沦陷后的南京,天堂(苏州)成了地狱,屠杀成了本性,妇女的厄运等章节。图片画册方面,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1938 年 7 月编印了《日寇暴行实录》。正气出版社 1938 年 6 月出版了梁中铭编绘的《暴日兽行纪实画》。

国外 1938 年 3 月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编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一书,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还出了加尔各答版。中国也于同年 7 月以书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了中译本,郭沫若写了序言。日译本也于同年在中国出版,鹿地亘、青山和夫写了序言。田伯烈的书不仅收录了南京的情况,而且收录了战争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各个城市所看到的情况,它充分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郭沫若在为中译书写的序言中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极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还有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1940 年写了《亚洲的战争》(The Battle for Asia,纽约,1941 年)。这本书也不

限于南京,而是有关整个中日战争的采访报道。斯诺在事件发生当时不在南京,但由于作者的文笔和声誉,这一著作在世界上影响很大。还有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史迈士(Lewis S·C·Smythe)1938年南京市及附近农村进行调查,写了《南京战祸写真》(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但其推算方法很有问题,特别对死亡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一弱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连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此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1937年12月16日到1938年2月间向日本使馆就日军南京暴行提出的报告和为保证难民的安全发出的公开信,共四百四十余种,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为《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Limited, 1939),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档案与史学》

《档案与史学》双月刊是由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档案与史学》既公布珍贵的档案史料,又发表研究文章及史实性通俗性作品,具有史料性、学术性、真实性和趣味性。

《档案与史学》主要栏目设置有:访谈录、档案架、史料研究、历史与人物、百年纪实、回忆录、珍档秘闻、掌故丛谈、文化探幽、书林漫步、译文、编研苑等。

《档案与史学》1996年起由邮局代理发行。

(本刊讯)